

新书掠影

本书是萨提斯著名的“3S”理论的发源之作，阐明了保护自然环境(土壤)、维护个人福祉(心灵)和拥抱人性价值(社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要务。



《土壤、心灵、社会：我们时代的新三位一体》 [英]萨提斯·库马尔 著 张兰英 张鹤辉 等译 中译出版社 2023年9月出版

中国艺术在时间超越中体现出独特的历史感、人生感和宇宙感。“四时之外”这四个字，可以说是中国艺术的灵魂。本书主要从时间和历史入手，来讨论中国艺术的发展和核心观念的形成。



《四时之外》 朱良志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9月出版

费曼为20世纪的物理学开辟了一条非凡的道路，他是天才中的“魔法师”，是科学家们的偶像。本书是他的传记，也是科学黄金时代的“群英图”。



《费曼传：天才的人生与思想世界》 [美]詹姆斯·格雷克 著 高爽 赵晓燕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3年10月出版

启蒙时代也是现代常备军的组织模式和战术原则得以奠定的时刻。作者叙述了18世纪的军事启蒙，展示了那些富有启蒙色彩的思想如何继续影响今天的战争伦理。



《战争与文明：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 [美]克里斯蒂·皮奇切罗 著 李海峰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年9月出版

在唐代文书体系中，奏教居于核心地位。本书从公文形态与政务运作联动关系的角度入手，对唐代奏教体系的变化与中樞政务运作机制的演进加以研究，丰富了唐代文书运作与制度变迁的若干面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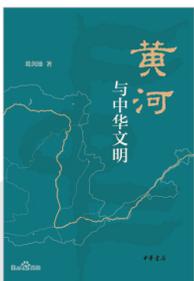
《文书之力：唐代奏教研究》 郭桂坤 著 商务印书馆 2023年7月出版

书人茶话

“尽人事”与大河安澜

邹贇韬

相传4000多年前，尧帝在选用鲧治理泛滥洪水之际，曾提出一条精辟的人水关系纲领——“顺水性而治，使安澜”。“顺水性”，即顺应水势应对洪峰，将人的介入干预建立在尊重河流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千百年来，伴随治水实践与总结的持续进行，“人乃水患症结”的命题逐步浮出水面。晚清民初的科学启蒙，又为此类阐释贡献了更多颇具说服力的实证。1936年，水利工程学家周郁如在《水灾的成因和减少水灾的方法》中把水灾成因划分为四种：“雨量集中”“与水争地”“河流自身造成”“无整个造林计划”。当中第二和第四点，明确属于人为诱因。近代水利界对人为因素与洪灾联系的认识，较之前近代粗糙的治水常识已大幅细化，但其结论指归却保持了高度的古今统一：唯有处理好人本身的那部分事宜，奔腾不息的大河才有可能常保安宁。



《黄河与中华文明》 葛剑雄 著 中华书局出版

《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 [美]穆登博 著 元民 译 九州出版社出版



《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 [美]陈学仁 著 耿全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种循环推理之中，他们特定的战略目标成为确定成功的唯一标准，而死亡人口数据的统计差距竟达到数百万”。统计、应对口径的互相排斥，势必让“灾情复合体”的乱麻日益纠缠，乃至步步拖垮本就脆弱易碎的社会生态。

面对具体灾情，洪水过后救灾、重建工作主持者须肩负的重责不胜枚举，当然不是小文这点篇幅所能容纳的，因而笔者更愿就“办实事”的心态层面而非具体细节内涵略抒些阅读收获。

“办实事”的水灾治理，应当明确治水是造福苍生黎民的义举，而不是什么别有用心者敷衍粉饰的“道具”。“人事”有实有虚，浮于浅层或借“天命”来遮掩“人事”的治水思路，无疑会按下水灾社会影响恶化的“加速键”。在《龙王之怒》中，作者对近代洪泛区地方官员敬祭龙王等民间信仰的仪式行为给出了精当解读：“考虑到宗教仪式的潜台词，给予神灵信任可能是一种非常明智的平息公众愤怒的方式，地方大员也许参加了这种他们相信有效的仪式，抑或只是将宗教仪式作为一场战略性的政治表演。”面对滚滚洪流，毫无虔诚之心的“不问苍生问鬼神”，是对百姓民生的漠视，也是对自然之力的蔑视。此般治水思路极尽人事之折腾，无论从出发点还是结果来评判，都全然算不上“人事”二字。

“办实事”的水灾治理，要深刻意识到灾情的源头往往不止自然水灾那么单一，且其危害积聚之肇端，势必远早于相关洪水自然过程的开始。《龙王之怒》中谈到，洪灾期间污垢满身的难民，被侥幸躲过一劫的城市富裕阶级视为“不文明”和“落后”的累赘。然而恰如作者所犀利指出的，当年“许多目击者没有意识到，正是在洪水下的极端条件下，或者说洪水前的贫困，使人陷入了如此绝望的境地”——洪灾只是水漫金山前社会积弊的一次“扩散显影”。如是，若想抑止洪峰触发的诸种麻烦，归根结底要在洪水未到时“尽人事”，统筹好灾情敏感人群(即社会弱势群体)的福祉保护与发展实现。遗憾的是，人类对创伤记忆的短期性以及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不均衡性，反复分泌着“下一场洪灾”的危险因子，而这理应得到治水各方的充分重视。

据国家水利部门2023年统计，近十年间，我国洪涝灾害年均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降至0.27%。这当中凝聚着无数防灾减灾工作者的呕心沥血，也离不开更科学、更尊重自然的发展规划、前行脚步。“海晏河清”的蓝图，因为我们更懂水、更爱水、与水更和谐，正在一步步由愿景变为现实。

前沿科技

精准医学 离我们多远吗?

杨翎

精准医学(precision medicine, PM)是近年出现的一个高频词，不仅见于各种媒体，也时常挂在老百姓嘴边。然而，除了字面理解到的那点意思，你是否知道医学发展到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实现精准医疗?其意义何在?精准医学对于我们的生活究竟将产生哪些影响?

《精准医学与我们的健康》一书由上海交通大学秦胜营教授基于2016年他开设的“精准医学与我们的健康”课程教学实践，结合精准医学领域的最新进展编写而成。贺林院士为此书作序，指出这本书“既是打开精准医学知识之门的钥匙，又为精准医学学科同行了解精准医学最新进展提供参考”。

精准医学理念最早可追溯到2008年，是指根据每个患者的个体化特征制定医疗方法。随着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宣告完成，通过基因组测序技术，人们已经能够知道个体的基因变异与疾病的相关性，从而可以综合评估单个患者的基因、环境、生活方式差异等，从而量身定制更适当的综合防治方法。

2013年5月，美国好莱坞女星安吉丽娜·茱莉在《纽约时报》发文，称其已接受双侧乳腺切除手术，以降低自己罹患乳腺癌的风险。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正是由于她在基因检测中发现BRCA1突变，该基因突变使她一生中罹患乳腺癌的风险高达87%。尽管如此，手术并不能保证她今后绝对不发生癌，只是癌变风险可显著降低至5%左右。当然，即便最终她不幸成为那5%的可能，我们也有方法治疗。实施“靶向治疗”，这是肿瘤精准医学的重要应用。通过检测相关基因，将乳腺癌患者分为不同亚型，针对相应靶点给予特异治疗，该癌症是较早开展靶向治疗的恶性肿瘤之一，目前获批的靶向药物已有十余种。

基因检测下的个体化精准治疗已成为一种医疗模式，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此外，精准医学的应用还涉及开展与药物疗效相关的基因变异检测，指导临床合理选择药物和剂量，提高药物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由此可见，精准医学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精准医学理念的产生离不开分子诊断，其进一步发展则有赖于生物学相关技术的革新。正是利用基因组测序，人们得以发现千万种与肿瘤相关的遗传变异，为精准医学奠定了科学基础。此后，新一代测序技术降低了基因组测序成本，促进了各类遗传性疾病的研究，并使大范围临床应用成为可能。像安吉丽娜·茱莉所做乳腺癌BRCA1/2基因检测，现在我们只需要在医院抽血，花费几千元人民币就可以完成。而基因组技术也带动了蛋白质组、代谢组、微生物组等各类组学快速发展，使人类能够从分子和细胞水平解读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机制，为精准医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支撑。

最后，本书还对精准医学在大健康产业中的发展动态和趋势进行了分析。精准医学健康产业在提高人类健康水平、节约医疗资源成本的同时，也将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目前，我国精准医学市场规模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精准医疗行业经过不断发展，在基因测序、分子诊断、药物设计靶点、临床数据等方面都有相当积累。精准医学已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或可引领新的医学时代。



《精准医学与我们的健康》 秦胜营 主编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

走出“农业中心论”，重思人与洪水的关系

毋庸置疑，中国是一个历史上长期以农为本的“重农”国度。该特质的形成与延续，和中国人口、土地等基本国情息息相关，但也有有形无形间损伤着人地关系的微妙平衡。是故在书写或品读洪灾历史时，作/读者均应审慎看待单方面的“农业受害论”，切不可漏失了农业“致灾因子”的客观存在。

与河流“争地”，是自然洪峰社会影响加重的一只“背后黑手”。1960年代，谭其骧先生观察了东汉以降数个世纪内黄河流域种植业消退与河流长期安定的联系，阐明了人类高强度农业垦殖活动是导致先前一段时期黄河水患频仍的关键原因。葛剑雄先生在《黄河与中华文明》中结合相关史实兴叹道：“黄河下游八百年安流的创造者，既不是王景，也不是什么治水专家或治天下的圣人，却是中游变农为牧或农业人口减少、耕地面积缩小的结果。虽然可能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却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无视大自然的规律，必然招致大自然的报复，对黄河不正是如此吗?”

和“争地”酝酿河流失衡危机相似，与河流“争水”，也会导致积重难返的调蓄系统瘫痪。大禹是历史上黄河重要的调蓄湖泊之一，其故地迄今仍是华北区域重要的蓄滞洪区，对黄河、海河流域水系统稳定具有重要价值。而在《黄河与中华文明》中，葛剑雄怀着遗憾再现了梅干大陆泽万顷碧波“最后一

块压板”：“雍正年间，正定、顺德、广平三府广开稻田，将原来流入大陆泽的水引作灌溉，水源更加减少。”蓄水空间在稻花香里消亡得无声无息，直到滔天洪水发出隆隆巨响，短视的开垦者们才乍然惊醒。

洪峰通过，怒涛渐远。在洪灾后半程，重建生活空间成为受灾地全体民众必须直面的紧要事项。此时，传统时期民众生计的相对单一性，与洪灾期间微观自然环境演化的复杂性之间，对冲产生了调和成本高昂的矛盾。据穆登博《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记载，1947年花园口溃决处堵复后，人们发现黄泛区“几乎所有的水井都被沉积物掩埋，水又变得十分稀缺”，为此各地被迫耗资数亿成本，紧急开掘了1600口新井方才勉强够用，初步保障了回迁农民“有水种地”。读到此处，笔者不禁想到历史政治地理上的“隙地”概念。无论利弊，洪水对经过区域地貌的重塑，都是一个人力难违的自然整饰过程。因而，与其在条件不成熟时仓促回迁，不如因循自然之道，在洪泛严重地区留出充足的人类活动“缓冲期”与“缓冲区”。当代成熟的生态移民机制，即是参照此逻辑展开，其效应可谓“人水两利”。

优良社会环境是弭平水患的根本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注重“政通人和”，将这一“人伦范式”借用到治水领域亦很恰当——“政通水顺”。优良的社会环境，是大河安澜的必需保证。

之于“水和”，最宏观而基础的“政通”是社会环境的总体安宁。《洪水与饥

荒》一书较新颖地引入能量视野，描述局势动荡对全面抗战阶段黄河治理的冲击：“与战争有关的混乱使得维持环境基础设施所需的能量投入变得不切实际，并进而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破坏。”作者还观察到，在相对隐秘的洪水治理期能量再分配程序里，优先保障战争背景下的河防巩固的原则，诱发了相当严重的次生灾害：“战争和水利维护消耗了农业恢复所急需的能量，灾害(饥荒)变得更加严重。”上引寥寥数言，生动写照了社会安宁才能积蓄足够力量应对洪灾、治理河流、改善洪泛区民生的历史规律。

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安宁是洪灾冲击减弱的先置条件，但假若在洪灾严峻之际一味地粗暴推行“安守”，苦于洪灾的百姓恐怕会遭到更可怕的戕害。陈学仁的《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评析了1931年武汉灾后出现的难民收容悖论，警钟之响震撼人心：“军方将难民从街头驱逐出去，并制定了强制收容的政策。然而，这些措施可能提高了难民的死亡率。”

大规模水灾，不单考验社会的“抗冲击”刚性，也对恢复期社会治理韧性构成了严峻考验。洪水所过之处，土地、水源、屋舍无不受损，疫疫、害虫、泥污多有泛滥。因而弭平水患是久久为功的中长期任务，需要高效持续的政治引导与政策帮扶，有赖于较高的治理主体领导力、动员力、公信力。《洪水与饥荒》中讲述了一个对比鲜明的案例：洪灾过后，国民党政府贪腐横行，肆无忌惮地大发“国难财”，致使民怨沸腾，“面对绝望的环境，难民们不得不将土地——往往是他们最后的财产——以低价出售。土地掠夺接踵而

至，人们对投机者充满了抱怨，而投机者通常是政府官员和军官”；而“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干部对洪水和饥荒时期被迫出售土地的家庭则实行土地回购政策”。人心所向，就是最大的抗灾韧性；民心所护，便是最强的重建营力。《洪水与饥荒》考察发现，扶沟、尉氏等地的中共红色政权，在1945年动员百姓合力修筑了数十公里堤坝，尉氏县的堤坝“将黄河水限制在一条固定的河道内，此举恢复了3300至4000公顷的土地。到1945年后，居民们已将这一地区20%至30%的土地开垦出来种植小麦了”。如此成效，着实让人感慨“尽人事”在洪灾恢复重建期的非凡能动性。社会之风清平，又何愁大河一时间不“平静”?

“尽人事”的最突出要义是“办实事”

“尽人事”具体意指什么?在笔者看来，一言蔽之，就是要有条不紊、踏实有力地“办实事”。

洪灾治理中人事之“尽”，要求执掌救援赈济事务者理顺洪水波及的方方面面，站在足够的高度上统摄地思考、综合地指挥。《龙王之怒》理出了1931年水灾发生后，国民党赈灾主持机构内部那错综复杂的统计与施救思路：“救济水灾委员会将救援工作划分为一系列要解决的孤立问题，这是专业偏见的完美孵化器。医务人员根据接种的数量来判断它们的有效性，慈善机构量化他们收到的捐款，工程师使用方程计算土壤搬运对小麦的消耗。”结果自然是空前的混乱与行动迟滞，“各方都陷入一

难免被“雪花”裹挟的熊廷弼

吕志学

历十五年”的影子。这两部书都是聚焦明清时期社会历史的通俗读物，写作手法上都是属于叙事史学。本书作者虽非历史专业研究人员，但在长期的新闻媒体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经验，从切入角度上可能也受上述两种图书的影响，不对某些历史公案做细节推敲，而是从更宏观的视角，试图从“庙堂之高”处找出个体命运在时代裹挟之下的悲剧源头。

按作者在书中的表达，熊廷弼之死的源头不能归咎于某个人，而是明朝的财政困境与党争合力的结果。这一主题与结论，在学术角度上谈不上新颖，毕竟是步了《万历十五年》的后尘。但是从时代角度来看，我想引用赵翼的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如同经典武侠作品需要翻拍一样，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典范。图书、文章也需要从不同角度去丰富认知，在对旧有范式逐渐补充推进的基础上，才能培育出相应的研究土壤，进而推动文化发展。《万历十五年》写成距今已逾40年。今天与当年相比，不论从资料收集的便捷度上，还是从时代观念的发展上，都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所以即使是同一主题，我们也需要引领新时代“风骚”

的作品。

从传记类图书角度来说，只要不是历史上确有明确论定的奸邪之徒(这类人的传也很少)，传主一般都会进行相当正面的处理。甚至说，既然为人作传，那么不可避免要以之为轴来绘制时代图，自然就突出了传主的作用与价值。对于宏大的历史事件，读者可以通过一个主人公来“拼凑”出整体，最终得出相对全面、恰当，至少是属于自己的看法。但是这种“无立场、全方位”的写作原则并不能完全贯彻到人物传记之中，否则写作主题容易失控。

本书中，“熊廷弼”这个人物主线更加鲜明，相比于群像式的描写，矛盾焦点更加集中，讨论各种问题更加直观。作为晚明变局中的一个直接参与者，而且是负担经略职责的高级官员，他的身份地位使得他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矛盾斗争的焦点。同时，他作为高级官员，对于下级来说，又是一棵需要抱紧的“大树”。而本书正如一些读者反映的，稍有些“一身系一国安危”的评书演义色彩。

从钱从的角度来说，明末想解决辽东危局，“非不为也，是不能耳”。甚至，为了解决军需与财源的问题，从万历时代的矿监税使至后来的“三饷”，反而成了激化矛盾的导火索。最终引发出一个有趣的问题：朝廷没钱，百姓没钱，官员也没钱，那钱都到哪里去了?当然，最终到底是谁有钱，历史会给我们答案，只是这个答案不是本书论述的重点。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来说，这种解读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模式。这就意味着，本书作者坚持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解读视角上摆脱了简单的旧史家“帝王将相家谱”的书写局限，回归到制度化、体系化的思考之中，承认“时势造英雄”，或者结合本书主题应该修改为“时势毁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也是作者对“熊廷弼之死”的认知之一。

最后，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党争。前文提到，熊廷弼对于下级官员来说是一棵大树，那么即便他“不党”，也最终会形成一种“不党而党”的局面。晚明的朝堂上，东林党与阉党两大斗争主流之外，其间还夹杂了诸如“齐党、楚党、浙党”等小党，这些群体，乃至东林党，究竟算不算“一党”很难说，却可以透

视当时朝廷上一盘散沙、内斗不断的状态。本书中，除了熊廷弼之外，王化贞、毛文龙、杨廷选、邹元标、叶向高等名臣悉数登场，可惜的是，他们在书中提到的“成就”基本都是在互相攻讦上面。从当时的形势看，不论他们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利，都应该务实而非空谈。况且，以他们内斗的诸多理由来看，是在以“圣人”标准要求官员——标准虽好，却不切实际。包括熊廷弼在内，以及之前的戚继光、李成梁，后来的毛文龙，被弹劾的理由大同小异。就如同前辈史家所言，在缺乏弹性的制度束缚之下，在所有人都不逾矩的情况下，很难做成实务，海瑞一样的“青天”虽好，却很难在当时的朝廷环境下获得施展空间。

正如如此，如果将“党争”的具体问题抽象化，最终可能只剩下“义理与事功”两大主题的斗争。“义理”成为党同伐异的最好武器，“事功”成为可以抓到“把柄”。官员们沉迷在文辞间中务虚，将实干派官僚打入冷宫，以案牍文章、道德仁义作为选派人才的标准。一旦有事，要求“实干”派官员“绩效”以为政绩，却对界外的大势闭目塞听。这样的朝廷，难以避免雪崩的结局，而少有的“砥柱”最终也难免被雪花裹挟，成为灾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味书屋



《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 唐元鹏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熊廷弼是晚明时期在辽东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和他的前任袁崇焕一样，承担了抵御乃至平定努尔哈齐的任务，却“功业未半而中道被杀”。至于杀死熊廷弼的主谋，众说纷纭，正如《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一书作者提到的，究竟死于阉党还是东林党，争议颇多，自然也可能是另有“主谋”。这本书试图从制度和阶层分析入手，来找到杀死熊廷弼的“凶手”。

这本书章节结构比较简单，一共七章，从万历时期的“高淮乱辽”写到“廷弼之死”。基本围绕“辽东——熊廷弼”的双主线展开，然后在后半部分，两个主线产生纠缠，最终引发“熊廷弼之死”这一结果。从书名来看，与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存在相似之处；内容梳理上，则可隐约看到《万